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 许德珩（1）

“五四”运动预备时期——“五四”的行动时期

“五四”运动以后——结束语

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 罗章龙（32）

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 俞　劲（42）

天安门前的爱国斗争 …… 黄勖志（45）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 高一涵（51）

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若干团体 …… 范体仁（56）

新潮社的始末 …… 李小峰（69）

新中学会纪要 …… 杨扶青　李　峰　张芥尘　于树德（110）

“五四”时期的陈望道同志 …… 邓明以（118）

我所知道的觉悟社 …… 谌小岑（125）

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经历片断 …… 卢松泉（142）

天津商界两次罢市纪要 …… 夏琴西（146）

对“五四”时期济南学生运动的回忆 …… 石愚山（153）

广州学生“五四”运动记 …… 邓曾骧（164）

“五四”运动在桂林 …… 李文钊（172）

回忆商务印书馆 …… 胡愈之(177)
我和北大 …… 沈尹默(191)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许德珩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六十年来，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变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当前，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又开始了新的长征。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从“五四”运动走过来的我，展望未来，祖国前程似锦，人民信心激增；缅怀往事，越发想念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以及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革命先烈。广大人民在“五四”运动中所要求的，解放以来不惟早已实现，而且发扬光大，还有许多是我们当年意料所不及的，如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我们今天只有努力学习，加深领会。文史资料的负责同志要我谈谈“五四”运动的情况，我鉴于上述原因，表示不必再谈了，但他们总是鼓励我，说还是把它写出来的好。我思之再三，我的年龄已经不小了，而过去写“五四”运动的书，虽然有的写得接近事实，但也有的写得不尽完全，我将“五四”当时的实际情况写出来，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此仅就自己记忆所及，写此文章，以志纪念。

“五四”运动预备时期

“五四”运动的远因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发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孕育起来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人民革命从此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虽然发生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但究其远因，却要追溯到“五四”以前的中国社会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先谈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一九一六年六月，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袁死，因反袁而流亡在国外的各方面人士纷纷归国，国内政治、思想、教育界一潭死水，由此动荡起来。可是一个袁世凯虽死，而众多的袁世凯出来了，中华民国依然如旧，武装还是军阀的武装，政权还是军阀的政权，并由此还引起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封建余孽辫子兵张勋还曾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挟清朝废帝溥仪宣告复辟，虽然不久即被消灭，但国脉又多受了一次摧残。孙中山先生想在黑暗中打开一个局面，曾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下旬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孙中山本人被选为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终因缺乏正确的革命方针，以致南方也发生了分裂，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来说，南北完全一样。孙中山先生也只好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去职赴沪，开始写他的《孙文学说》去了。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候，独自侵略中国，曾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以此作为交易，帮助袁世凯做皇帝。袁贼称帝心切，二十一条亡国条约，除其中的第五款以后商量外，其余均接受了。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段祺瑞打败了张勋，为了攫取中国政权，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继续承认了二十一条，获得了日本的大借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本帝国主义参加了欧战，站在协约国一边；我国也参了战，也是站在协约国一边，日本借口德国为敌对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同盟国，日本帝国主义和我国都是协约国，协约国与同盟国为敌对国），自行出兵我山东和青岛，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德国在我山东的权益，据为己有。事为我留日学生所知，极端反对，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抗议中日秘密协定，被日本警察拘捕多人，全体留日学生对日抗议、罢课回国。

学生爱国运动力量的兴起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倍受压迫，在为国家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过程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站在斗争的前列，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中华民族又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国内外学生都不能安心求学，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了。这次学生运动的主力在北京大学。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建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之际，前清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一所最老的大学，到“五四”运动那时已经有二十一年的历史了。它有文、法、理、工、商五科和预科，学生约一千八、九百人。一九一六年以前，校风很腐败，学生年纪大的相当多，举人秀才的学生也还有，校内工友称呼他们是“老爷”，以后也称他们为“先生”。学生宿舍只有马神庙西斋、沙滩东斋和北河沿八旗先贤祠（以后为译学馆，最后改为北大预科）三处，大部分学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整个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是马神庙理科有一座古老的藏书楼。学生中除少数死读书之外，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当时北京社会上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出像今天大字报一样的揭帖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这是当时北大的一般

情况。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一九一六年冬，蔡元培来到北大。蔡是清末的一位翰林，辛亥革命，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做教育总长，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蔡到校不久，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等等，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在当时确实发生过一些进步作用。他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来以后，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是《新青年》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也聘请了鲁迅、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以及以后的李四光、顾任光等这些在当时所谓“新人”来校任教。还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聘请了章士钊做图书馆馆长。章不久即辞职，推副馆长李大钊自代。李大钊是日本留学生，一九一四年章士钊在日本办反袁的《甲寅杂志》（即“老虎报”），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面写文章。陈独秀以后又在上海办《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当时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大概在一九一七年秋，胡适由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诸人写稿。他们虽然都是在《新青年》里面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可是从政治见解上彼此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陈独秀尽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其实质依然没有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虽然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它一定限度的进步意义，尤其白话作文方面。可是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如果离开了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方向，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做基

础，那就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革命意义。这种现象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也只有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同志，在一九一八年十月所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面，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两篇卓越的文章之后，才引起本质上的变化，才真正开辟出一条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的康庄大道。不过，当时社会上介绍这一方面的材料还不够多，报纸上报导的也不翔实，反动派常把"布尔什维克"译成"过激派"。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协约国胜利了，德国失败了，中国因为参加了协约国，有些人竟然把自己也看成是什么"胜利国"，一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高唱入云，受美英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被宣扬成"民主的象征"。留美归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杜威的学生蒋梦麟曾把它翻译出来。北大一个投机分子的学生傅斯年，因为要讨好胡适，自夸地说他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得出来。

胡适与李大钊同志在政治立场、观点上就有很多冲突，如李大钊同志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同志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自己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同志站在学生一边，参与学生运动；胡适则站得远远的，并主张二十年不谈政治。过去曾有过"胡适领导'五四'运动"的荒谬说法。必须指出，当"五四"运动发动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他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更谈不到什么"领导'五四'运动"。可是"五四"运动的怒潮，却真是把胡适吓倒了。当胡适由家里回到北京的时候，北大和其他各校学生还正在罢课，胡适曾出面劝说学生复课，结果被学生严正地拒绝了。胡适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动师生有愿去者签名，追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马叙伦、刘文典同志对此大不以为然，刘还把傅、罗签名的事告诉了陈独秀，陈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胡适的如意妙算结果没有成功。这

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是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徐彦之、毛子水等，办了一个《新潮》杂志，后来参加的还有汪敬熙等。《新潮》杂志在出版时自吹自擂，刊登广告说它是“北京大学之新潮”。由于胡适的关系，北京大学每月给大洋四百元作为《新潮》的津贴费用。这个刊物主张白话作文，偏重于文字改革运动，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反侵略、反卖国的运动却起了不少的反作用。《新潮》杂志的主办人后来全部倒退，走向反动。

第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校长到校后，聘请了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煜瀛）来北大教生物学，聘请了当时伪装进步的反动分子吴稚晖（敬恒）当学监。李石曾只来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吴稚晖来到了学校未正式就职，但无政府主义思想却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李、吴这帮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旅欧周刊》，大汉奸褚民谊做编辑，经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有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的著作。蔡元培本人当时也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就助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学生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水平低，又有社会上这些“名流”来鼓吹提倡，所以北大在最初一个时期，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还不少。记得其中最活跃的有凌霜（黄）、声白（区）、太侔（赵）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我们组织的学生爱国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改为学生救国会）。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示威请愿运动，北大学生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倾向的人是不参加的。

第三是《国故》派的人物。学生中有张喧、伍一比、罗常培等。教员方面原有拖着一条大辫子的最顽固的复辟分子辜鸿铭，年轻的英文教员、流氓分子"探艳团"团长徐佩铣，当时的文科学长、老顽固夏锡祺等。蔡元培来校后就把他们排除出去了。当然蔡之排除顽固守旧派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彻底的，他也把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申叔）聘来当文科教员，条件是不谈政治。他还把清朝遗老、投什刹海"殉节"而死的梁巨川之子投考北大未录取年仅二十二、三岁的梁漱溟，找来教印度哲学。以黄侃（季刚）、刘师培等人为首的"卫道派"，反对白话文，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刊行了《国故月刊》。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成立了很多社团。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图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等。同学集股办的消费公社，在马神庙路北，后来"未名社"还用过那个房子。还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对它特别重视。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衡恪）、音乐家萧友梅、刘天华都网罗在这些学会之中。二十一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后来并资送他往法国学画。还有些活动，今天的青年听来是要好笑的，如静坐会，每个人带一个蒲垫，去听蒋维乔（竹庄）的讲演。一时学校的空气甚为活跃。

此外，蔡元培还发起了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入会的称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它以消极的"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尤其是针对北大学生的恶习，表现了蔡元培的"道德救国"和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

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在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北京大学形形色色的各派政治思想的一个概况。

学生救国会的形成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学生的积极响应。五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了北京，与我们见面，经过几天的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五月二十一日发动了向反动统治当局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有北大、高师、高工等学校二千多人。当时推出向公府（即总统府）请愿的代表八人，其中北大三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但是，这次运动出于仓促，准备不够，又因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因而没有发生所希望达到的影响。同时，北京大学思想不一致，内部有一帮坏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此次学生爱国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我们“要纠众造反，向政府请愿示威”，“这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人这种卑劣无耻行为，受到了蔡校长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学生的鄙视，同时也给了我们以教训，使我们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

这次的游行请愿运动，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却因之组织起来了。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暑假中，派出了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以通声气。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学生已经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到会的人很多，我记得有：马骏（工专学生）、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叫张太雷）等人。正当欢

迎会开得很热烈的时候，张传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个小指头砍掉了，以此来激励国人。他们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同志由日本归国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了。邓颖超大姐这时也出来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找到了康生，他当时名张绍卿，又名张三洗，我们同他谈了发展组织的事，没有开会。由济南转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们组织了文化书社。我和恽代英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虽是初次见面，但仿佛很熟，真是一见如故。由武汉到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以及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也找到了湖南林祖烈（林伯渠同志之弟），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上海学生方面有复旦的狄侃、程学瑜（以后改名为程天放，成为反动头子），华侨学生何葆仁，圣约翰的瞿宣颖，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沈策民，以及南洋公学的恽震、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等人。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上海妇女方面的人特多，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杲、程孝福，神州女学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五四"以后也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恺、朱执信先生，他们在上海以后还办了一个周刊《星期评论》和月刊《建设》，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这时毛泽东同志往来于京沪，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他团结了男女青年数十人，其中有蔡和森、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女会员有向警予、李思安、周敦祥、魏璧、劳君展、蔡畅、杨润予等。这时，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办了一个《救国日报》，我们有事就互相商量，于工作便利不少。同时，上海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七月的某一天，在龙华体育场召开大会，并欢迎我们，到会的有几千人，有工商各方面的代表，会开得甚为热烈。还邀请了北京学生代表报告学生运

动情况。我们在上海停留了二十多天。这样总算联系好了。我们还派人到广州联系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会非常议会议员。也派人到湖南岳州联系了岳州镇守使冯玉祥将军，因为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由于我们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我们于九月初返回北京。

一九一九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新潮社的成员以前是不参加学生救国会的，"五四"后，在李大钊同志的促进说服下，他们参加了运动并派罗家伦、康白情为代表，参加了北大学生会。无所属的陈公博、狄膺（福鼎）也参加了北大学生会。

《国民杂志》的问世

为了加强联系，做好宣传工作，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个刊物《国民杂志》，经费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每人出五块大洋，共凑了一千五百余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可见大家热情之高。因为办这个杂志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不是谈文学革命，参加的人又不限于北大的学生，所以北大当局不让我们在北大校内挂牌子（虽然北大的同学参加的很多），于是我们只好在北池子骑河楼路南一所房子里租了一大间房子，通信、开会、讨论问题都在这里。原定于一九一八年十月杂志正式出版，但在筹备就绪之际发生了问题，学生救国会管理会费的学生鲁学祺，竟挪用了会费五、六百元，使刊物的出版受到了影响，只得推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据我所能记忆，担任编辑的有邓中夏（康）、黄日葵、高尚德（君宇）、陈宝锷（剑修）、陈钟凡、马骏、许德珩以及张国焘、段锡朋、孟寿椿、易克嶷等。还约请了李大钊先生做我们的指导，约《京报》主笔邵飘萍和画家徐悲鸿做我们的顾问，并约杨昌济（怀中）先生为我们写文章。尤其是李大钊先生经常给"国民"写稿，他有两篇批判

胡适的文章就是在《国民杂志》上发表的。邓康（中夏）同学用“大壑”的笔名每期都为杂志撰述“国内外大事”，介绍国际新闻。《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产党宣言》译文连载）；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在“国民”上没有全部登完。李泽彰后来由胡适介绍给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成为王云五的亲信了。

《国民杂志》最初是用文言发表文章，因为它是全国性刊物，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容易接受。“五四”以后的《国民杂志》就改为白话文了。

走上街头讲演和大学开放女禁

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所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事先酝酿很久，先是北大学生有“校役夜班”（即工人夜校）之设立，目的是为校内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效果良好。以后改成讲演团并扩大到校外，成为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北大学生以及它校学生有很多人都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在成立会上推选了职员，邓康（中夏）同学被选为总干事。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就经常到街头群众中间讲演，出发时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有时也不事先选地点），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宣讲办法，携带一面小铜锣，到人多而适当的地方，主讲人站得高一点，另一个人打起锣来，于是就开讲起来。庙会是我们最好的讲演场所，可是常常被警察干涉。这个讲演团到“五四”运动就成了学生会的一个组织，参加的人

多了，几乎每天都要到街头去讲演，或贩卖国货和书报。

学生救国会本身这时也有了发展，上次的示威请愿运动只有男学生参加，没有女学生，也没有工人，于是大家讨论，认为这应归咎于受了孔子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劳动民众）为难养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由于孔子轻视妇女与劳动人民，提出劳动人民应当养活贵族老爷而贵族老爷应当统治劳动人民的这种言论，因而使大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礼教"的口号，并要求北大开女禁，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以求达到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之间，为此事北大校长蔡元培还同林琴南（纾）打了一场笔墨官司。此时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女生，可是中国妇女因为受旧礼教的束缚压迫已久，初次招收女生被录取的并不多。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

还要谈一谈与"五四"运动有关系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李大钊等同志于一九一八年六月间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组织起来的。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这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成立。李大钊同志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会员最后发展到一百〇八人，主要有下列几种人：（一）向往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小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少数学生。就我记忆所及，如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等同志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当中有好些都是起领导作用的。参加的人还有杨钟健、许德珩、章廷谦（号川岛），以及周炳琳、孟寿椿、周太玄等。后来堕落成为反动的国家主义分子青年党

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也混进了这个组织。还有参加新潮社的新诗人康白情，陕西文人郑伯奇等。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不能充作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的，也要请他退会。写《中国佛教史》的黄忏华和讨了小老婆的罗季则，就是请他们自己退会的。它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任主编，出版了《少年世界》，邓中夏是负责人之一。这个学会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以后虽因立场观点不同走向分裂，但在当时对于"五四"运动是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一六九页)

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别的社团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战线，在任务和工作方面也渐渐地由朦胧而显明，比先前更实际更具体了。在学会中李大钊同志又提出"主义"来。学会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位都是评议员。现在看来，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相当复杂，思想也是极不相同，但是在当时会员中有这许多共产主义者，而且领导着这个学会，对"五四"运动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叙述早已不存在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因为它对于"五四"运动起了帮助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各方面的团结，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团结，以及全国青年团结，而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则是李大钊同志。由于这样的广泛的团结，才有力地打击了凶恶的敌人北洋军阀，赢得了胜利。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所以一经爆发，就能很快地成为全国普遍的运动。

“五四”的行动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苏联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楼）。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明天他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在中央公园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只有李大钊同志高呼“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一文，原是李大钊同志讲演稿），欢欣鼓舞地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听众中有很好的反映。

“五四”前夕的决定

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四月底，巴黎和会这个强盗分赃的会议决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关于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议。五月二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